
对九一八事变至 1935 年前中共中央路线 策略的两点看法

金再及

在局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面临着策略转变的问题。对国民党来说,是从攘外安内政策转变到联共抗日政策;对共产党来说,是从关门主义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心是一个,即从两党对立的国内战争转变到联合抗日。总结这一段两党策略转变的经验教训,不仅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我准备就对九一八事变到 1935 年“八一宣言”发表前这一历史阶段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当前史学界存在的不同意见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对九一八事变到 1935 年“八一宣言”这一历史阶段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究竟应当基本否定,还是应当基本肯定?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基本肯定。他们提出:“对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对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力量和作用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只是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则只是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开始是坚持下层统一战线,但在倡导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国内和平、进步和民主等方面,仍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中共中央在反对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主张坚决实行武装抵抗等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坚定的,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人民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积极组织群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中共北方组织积极协助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战等。第



二, 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中央发出了三个文件, 一是 1933 年 1 月 17 日的《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二是 1933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委及全体党员的信》, 三是 1934 年 4 月 20 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三个文件“为突破下层统一战线迈出了步伐”, “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打下了基础”。我认为, 这些根据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 应当肯定, 中共临时中央在抗日问题上是坚决的, 它和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 主张抗日还是不主张抗日, 这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 和联合哪些力量抗日的路线问题没有关系, 它不是区分关门主义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准。区分关门主义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 在于能否正确对待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积极变化的中间派, 和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主张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可以以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战为例加以分析。在这些事件中, 中共中央指责马占山的嫩江抗战是“在‘抗日’的招牌之下, 利用兵士与民众的反日斗争, 欺骗革命的士兵与革命的民众……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 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而失败”; 号召十九路军在抗日火线上推翻蒋光鼐、蔡廷锴等的领导, 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 严厉批评中共北方党部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做法是“上层的联合战线”的策略, “与中央屡次所指示”, “丝毫没有相同之处”, 要求他们把冯部“发展成为红军”, 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 建立北方苏维埃。上述情况说明, 临时中央的错误不仅仅是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

刘庭华、岳思平:《抗日与统一和安内攘外——与贺新城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请看!!! 反日战争如何能够等到胜利?》1932年2月26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年出版, 第105页。

《中央给北方代表田夫同志信》, 1933年7月26日。

《中央给河北省委的秘密指示信》, 1933年6月13日。

而是全局性的错误。

其次,怎样看待中共中央发表的《共同抗日宣言》等三个文件?无疑,从文件本身看,这三个文件是正确的,应该肯定。这些文件发表后,在客观上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就象在正确路线之下可以有错误的文件一样,在错误的路线之下也可以有正确文件。现在我们所要评论的不是文件本身,而是临时中央在这个时期的路线和方针,这当然就不能孤立地看这三个文件,而要研究和分析中央发表这些文件的真实意图,把它们放到全局中和中央其他文件作比较,看它们能否代表中央的路线,更重要的是要看临时中央在实际行动中是不是贯彻文件精神的。

其实,临时中央发表这些文件的意图是明确的。《共同抗日宣言》发表后,中共中央立刻发出通知,反对把《宣言》看成是“与国民党合作”或者“减轻与国民党的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曲解”。根据中央的精神,苏区中央局也发出通知,告诫说:“国民党的军阀是不会接受我们条件的”,因此,在“宣言的显微镜下,将更清楚的暴露国民党的狰狞面目”。1933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就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更明确指出:发表《共同抗日宣言》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打击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党派,以争取最大多数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完成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条件”。对《中国人们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央也解释说:发表《纲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揭穿国民党卖国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可见,临时中央发表这些文件,只不过是把它们当作是宣传工具和揭露、打击、孤立国民党和一切中间派的武器,并不准备实行。

中共中央委员会、江苏省委员会:《给上海工厂支部的一封信》,1933年1月27日。
《苏区中央局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红军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宣传大纲》。

中共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信》,1934年4月20日。

不可否认,临时中央的上述错误受到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张闻天曾向博古提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福建事变时,毛泽东曾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他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主张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他向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他们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接受,临时中央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说“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不过是“一种欺骗群众的把戏”。同样力主支援福建人民政府的彭德怀还被斥为“冒险主义”。不久,三军团奉调至江西保卫中央苏区,福建人民政府因孤军奋战而失败。铁的事实说明,当中央领导权掌握在犯有“左”倾错误的同志手中时,正确意见是无法实施的。我们决不能对王明“左”倾错误对党的统治的深度和广度估计过低。

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对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路线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4年1月1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3—24页。

作了如下的评论。他指出：一方面，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很明显，这里讲的“主要方面”，说的是党的路线的全局错了；至于在一些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属于最“基本”的问题上，则犯错误的同志和我们没有争论，是属于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有的同志把这个结论变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提法：“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后坚持土地革命方针和主张武装抗日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么一改，和毛泽东的原意正好相反，就变成肯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反蒋策略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反蒋的口号还对不对？这也是当前史学界存在着严重分歧的问题之一。有的同志认为，“抗日反蒋”口号是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制定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基本口号和政治方针，应当否定，改而采取“逼蒋抗日”的政策。也有的同志对这个口号作绝对肯定。他们认为，“抗日和反蒋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要抗日就必须反蒋，临时中央的错误只在于对中间派犯了关门主义，但在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上是正确的，“从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发表的几个宣言来看，是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放在第一条地位，而把‘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口号放在后面的位置”；还有同志认为既然蒋介石在向我们作武装进攻，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以前进行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就应当全盘肯定。

反蒋的口号对不对？我认为，这个口号总的来讲是对的，因为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939页。

刘经宇：《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载王淇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讲座》，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蒋介石从安内攘外政策向联共抗日转变有一个过程,一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才出现了这一转变的迹象,而在1931—1935年间,他一直坚持把主要力量用于剿共,不存在近期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从促使蒋介石态度的变化“逼蒋抗日”来说,也只有在军事上对蒋军的进攻给予坚决的回击,政治上揭露蒋对日妥协、对内内战独裁的政策,使之陷于极端孤立之中,才有可能促进蒋态度的变化。因此不能说这个口号是一个冒险主义的口号。

但就像“左”倾中央坚持土地革命方针是对的,却不能认为它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革命路线也是正确的一样,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时期临时中央的对蒋策略是正确的。

临时中央对蒋策略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颠倒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把阶级矛盾放在第一位。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发表的宣言、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反日必先反蒋,反蒋是反日的前提与先决条件。文件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战略口号,并且提出党在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把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引导”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里主次是清楚的,不是使阶级斗争服从并服务于民族斗争,而是要把民族斗争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一·二八事变和察哈尔抗战时,临时中央才会作出在抗日火线举行暴动这样极端错误的指示。

其次,错误地继续坚持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以前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我们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对南京政府的反革命军事“围剿”进行坚决的回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斗争在政治上应当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临时中央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46—447页。

在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采取武装推翻南京政府,夺取全国政权的苏维埃革命方针,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把“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说成是“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提出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甚至要“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这种做法不仅对阶级力量对比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更重要的是脱离了抗日斗争的实际,脱离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是完全错误的。

(作者单位:北京电子自动化工程学院社科部)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35页。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4页。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1934年1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7页。